

## 学林|学人

← (上接5版)

奏一首曲子,我点了肖邦的《升C小调幻想即兴曲》,我很喜欢这首曲子。那个学生却不愿意弹,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是技巧的问题,但是他一定不能满足我的期待。然后他弹了一首李斯特的难度非常高的曲子,我听得也是云里雾里。他倒是很满意,觉得我的水平你也看到了吧。后来这些学生跟我说,他们在外面演奏也经常挑选这种难度极高却没什么思想深度的曲子,大珠小珠落玉盘,他们觉得很成功,我说这叫‘炫技’。因此,在他看来,想要演绎好作品不仅仅需要一种工匠式的技巧的训练,也需要深厚的人文素养作底色,“我觉得音乐学院应该多开设些相关的课程,讲讲文学作品和西方哲学,这对学音乐的学生会很有帮助。”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对伟大作品的成功演绎?按照王德峰的理解,是要让过去那些伟大的作品活在当下,将作品的精神引入对当代问题的探讨。“近代西方古典音乐是人类音乐艺术的最高峰,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它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当代西方音乐发展的方式是‘演绎’而非‘创作’,主要是看指挥家和独奏家,他们承担着很大的使命,在我看来就是真理的事业。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不能仅仅从他的指挥技巧上来评价,而是看他能否把这个作品的精神引领到当代。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切利比达奇了不起?因为他的境界很高,他并不追求技巧这种外在的吸引,而是能体会时代的困境,理解当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无家可归的状况,并把那些伟大的作品同人的当下处境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业。”

“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当我们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怀之中,比如说关怀民族的名义、关怀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关怀我们自己。”采访的尾声,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们总是把对艺术的欣赏片面地理解为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仿佛我们是一个空洞的容器。其实它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努力去成为那些伟大作品的知音。一部优秀作品的精神和价值,是等待作品的接受者自己去发掘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发掘,作曲家就会觉得自己是极其孤独的,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知音。这也是为什么听音乐听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作品都是为自己所写。听贝多芬的作品,听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写的吗?我就是贝多芬,这就说明贝多芬成功了,他让王德峰成为了音乐家。”

## 清末一次股票风潮的启示

陈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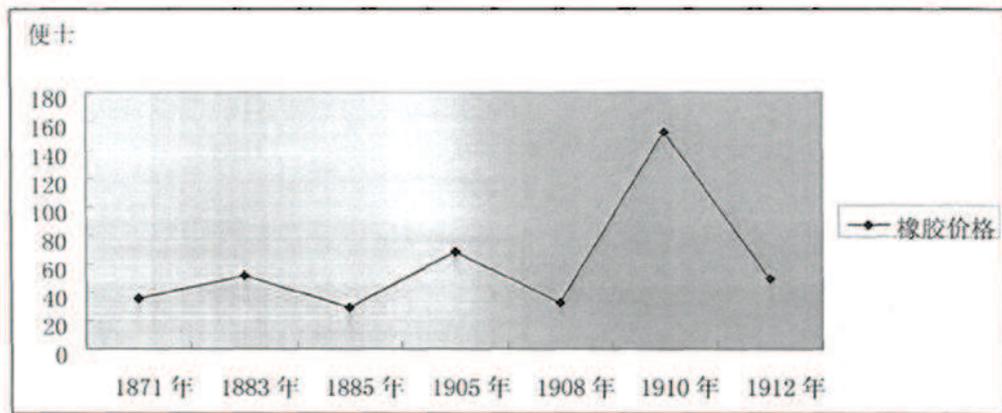
清末实体经济的发展受战乱、外患等因素影响,发展不稳定,这驱使钱庄资本高度介入非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投资套利活动,沉迷于股票买卖投机,一旦市场泡沫的破裂就会带来严重后果。1910年这次橡胶股票风潮不外如是。当然,在此过程中,为了缓解由橡胶股票投机泡沫破裂所引起的金融风潮冲击,上海官商还是协同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20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末商事制度改革新政迭出,各类新式工商业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从上海金融市场时局来看,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类中资新式银行纷纷设立,蔚然成势。尽管如此,中资新式银行在彼时的上海金融市场格局中依然只是配角,真正占据主导的仍是外资银行和钱庄,其背后潜藏的则是鸦片战争后钱庄与外资银行、外国资本在长期的银钱往来中,所逐步形成的紧密纠缠利益纽带关系。为了更顺利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并从当地进行原料采购,外国资本和外资银行须利用根深枝茂的传统钱业作为其立足上海、深入内地的金融桥梁,而这一关系在当时上海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中又进一步得到强化。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变迁中,钱业的发展并未与时俱进。虽历经1883年倒账风潮和1897年贴票风潮,但上海钱业的业务模式、风险控制和监管方式等改进有限,以致1910年橡胶股票金融风潮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与前两次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次金融风潮共通的根源是钱商的高度投机,但与前两次肇端于钱业自身不正当竞争等因素不同,橡胶股票金融风潮有较强的外部国际市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上海钱业直接参与叠加间接卷入国际橡胶股票投机失败所致,与世界金融市场和橡胶市场的波动、联动有很大关联。这次风波加剧了传统钱业的由盛转衰、由强走弱,其主导地位最终由新式银行所代替。

## 从投资演化成投机的橡胶风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汽车、自行车、电气等众多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国际市场橡胶



1871-1912年伦敦橡胶平均市价图(单位:便士)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

需求急剧增长,呈现供不应求局面,国际橡胶价格随之快速上涨。不少商人见此获利机会,纷纷到热带地区的南洋群岛上成立大量橡胶种植公司。随之,上海市面也出现了许多橡胶公司,并依托上海的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其中,较为知名的是1903年英国商人麦边(George McBain)在上海筹设的蓝格志(根据橡胶产地LanKets音译)拓殖公司。麦边声称,公司在南洋经营橡胶园及发掘石油、煤炭及采伐木材等业务,投资入股必赚大钱(陈旭东等《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6页)。但是,一开始业务清淡,鲜有人问津。

随着1908年美国福特T型车及其汽车装配流水线的问世,全球汽车行业进入一个新纪元,对于橡胶的需求被再度激发。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国际市场橡胶价格普遍上涨且涨势强劲。麦边乘势在《申报》等媒体上大做广告,并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今后之橡皮世界》,极力宣扬橡胶“未来三十年预算之求过于供”(姚公鹤《上海闲话》下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20页),声称种植橡胶树可获厚利,橡胶股票的行情看涨。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购买其公司股票,蓝格志公司还暗中唆使同伙收买股票乃至提前派发

股息。其他一些公司甚至专门招揽人佯装购买自己公司股票,或与外国银行做橡胶股票抵押借款。“羊群效应”之下,投资者纷纷跟风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的橡胶公司开始大量涌现,到1910年已增至40家(杜恂诚《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改革》1997年第2期)。

上海市场的橡胶股票价格直线上升,使得全国陷入了橡胶股票投机的亢奋之中。单蓝格志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从农历1909年12月1日的920两上升至1910年2月19日的1675两,接近翻番(徐华《从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看清末的金融市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上到盛宣怀、蔡乃煌等显赫官员,中到臧纯芳、刘长荫等工商巨子,下至太太小姐、平民百姓,纷纷加入抢购热潮(卢书铝《橡胶股票风潮始末》,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上海许多钱庄也深度参与进去,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大量放款给橡胶股票投资者,二是自身也积极收购和持有橡胶股票。在此期间,上海钱庄大量增发庄票,抢购橡胶股票,仅正元、谦余、兆康便发出庄票面值600万两,同时与这三家钱庄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的庄票也被调用,一起

进入投机活动圈内(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甚至在自有资金用罄后,上海钱庄还从外商银行处拆借了大量资金续投股市,其参与程度之深可想而知。

据统计,在这场橡胶股票交易中,国人单投入上海市场就有约2600—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约1400万两。然而,1910年国际市场橡胶行情开始出现盛极而衰、掉头下跌的趋势,伦敦市场橡胶价格从4月的每磅12先令5便士跌至7月的9先令3便士(菊池贵晴《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上海的外商银行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首先停止贷款给钱庄,同时宣布不再承做橡胶股票的押款业务。一些外资橡胶公司的创办者也利用信息传播时差和信息不对称,借股价处于高位时就纷纷抛出所持公司股票,携巨款出逃国外。随着国际市场的不利信息陆续传入上海,那些曾大量抢购橡胶股票的投资者又竞相将所持有股票抛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橡胶股价一泻千里,外商银行也开始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前做押款,大量持票人因此破产。

(下转7版) →